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国民意识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张义素

内容提要：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制度为样板的西方民主教育体制。随着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军国主义路线的逐步形成及《教育敕语》公布，日本最终选择了在利用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教育体制。在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下，日本国民意识中的“效忠天皇的意识”极为浓厚，迷信天皇、尊崇天皇成为日本国民居主导地位的精神思想。

关键词：日本军国主义 教育体制 教育敕语 国民意识 效忠天皇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使国家迅速发展起来。随之，日本为与西方列强争夺与瓜分世界，欲称霸东方，其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不断确立和强化军国主义体制，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而在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也促使日本军国主义更加法西斯化。军国主义教育对日本国民意识产生严重影响，促使日本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军国主义所左右，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一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了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制度为样板的西方民主教育体制。该体制实施几年之后，围绕着建立

什么样的教育体制问题,在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的实质是继续保持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还是建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民主教育的问题。随着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军国主义路线的逐步形成及《教育敕语》的公布,日本最终选择了在利用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体制。

(一) 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

军国主义教育是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军国主义路线的逐步形成,学校中的军国主义教育也逐渐形成和加强,这为以后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治初期颁布的《学制令》中,尚未出现军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随着军国主义思想的加强,在 1880 年修改后的《教育令》中,就开始出现了“尊皇爱国”的字句。在 1890 年 10 月 30 日日本天皇亲自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更是暴露无遗。其具体内容是:“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日本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职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辟世务,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机,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独可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显彰尔先祖之遗风。”^①

当时,日本政府把《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教育的总纲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标榜天皇是道德的化身。为了把“国体精神”和《教育敕语》精神贯彻到学校,日本政府开始对学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日本政府为了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36 年设立了“文教审

^① 山住正己:《教育敕语》,朝日新闻社,1980 年。

议会”，开始对“关于国体观念的彻底和振兴国民精神的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和审议，通过审议后认为：为实现“八 一”的肇国精神，必须确立把学校变成“国民训练的场所”，把从国民学校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纳入“皇国之道”的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最终使教育完全纳入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体制。

以小学为例，看一看日本政府是如何对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首先将小学的教育目标从过去的以知识教育为主改为以“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为主，把教授“普通知识技能”限定在“生活必需的范围内”。1891年11月17日，日本制定了《小学教育大纲》，其核心就是向小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天皇说成是“万世一系”的神，在小学生中树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使他们绝对服从天皇，无怨无悔地为其服务。

1941年4月，日本政府颁布《国民学校令实施规则》，该规则的开头是这样规定的：“奉体教育敕语之精神，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学习皇国之道，特别应坚定对国体的信念。”^①在国民学校中重新强调了一切教育活动以《教育敕语》为基础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军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日本政府除了系统地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外，还经常举行一些效忠天皇的活动。如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礼拜等。

在军人学校、师范学校以及青年学校，除了贯彻《教育敕语》外，还设立了“步兵操练科”，确立了军事体操制度。

总之，《教育敕语》被强制灌输给孩子们，使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接受军国主义思想，逐步被卷入了具有“玉碎”思想的集体之中，最终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

^① 山住正己：《教育敕语》，朝日新闻社，1980年。

(二) 军队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

江户时代末期,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新政权。为了巩固天皇新政权,明治新政府开始建立近代化的军队。其基本方针是建立举国皆兵的军事体制,把强兵和对外侵略作为国家首要政策。掌握着当时兵部省实权的山县有朋(长州出身,前“奇兵队”总督,后任陆军卿)与西乡从道(萨摩出身)联合起来开始整顿军队,1870 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

1873 年 1 月,明治政府颁布了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常备军。为了强调军队效忠于天皇,故取名“皇军”。为了加强天皇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在组织上,于 1878 年设立了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构——参谋本部。该部负责处理一切军令事宜,军部大臣可以不通过内阁会议讨论直接上奏天皇。结果使军部的权力越来越大,最终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和控制,陆军卿山县有朋于 1878 年颁布了《军人训诫》。该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

日本军方在教育的实施和管理上都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措施。明治时期负责部队教育的部门是监军部,后来改为教育总监部。军队教育又分为学校教育和部队教育。院校教育有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兵学校、航空士官学校等。部队由各级指挥官直接负责教育。对部队和军人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和执行《军人敕语》、《军人训诫》、《作战要务令》、《步兵操典》。1941 年,日军还颁布了《战阵训》。这些都是强化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军队内务条令》则是约束军人和士兵接受教育的条令。

1882 年 1 月,明治天皇亲自向陆海军卿颁授了《军人敕

语》，敕语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率”，“朕为汝等军人的大元帅，朕视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这种亲情是应当特别予以加深的”^①。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谁敢违抗必将遭到制裁，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干涉统帅权，最终将受到制裁。《军人敕语》还以“忠节、礼仪、武勇、侠义、质素”等五项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必须遵守之德目。

在日本军队中，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都要受到严格的、强制性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部队要求军人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语》，如果背不下来或背错，则要受到暴力惩罚。

对军人还进行彻底的武士道精神教育，使其确立不以生命和自己为重而以天皇和国家为重的帝国军人思想和精神素质。

（三）通过社会团体进行广泛的军国主义教育

除了通过国家教育部门、各种学校、军队贯彻《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语》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外，日本政府还利用各类右翼社会团体，鼓吹军国主义，灌输军国主义教育思想。

早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著名右翼团体玄洋社（1885年成立）、黑龙会、浪人会等在右翼民族主义头目内田良平、头山满等主导下，大力宣扬国粹主义、日本主义，拥戴天皇制“国体”，实行侵略扩张的“大亚细亚主义”等，对军国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日本进一步介入侵略战争，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突出，日本的民族主义更加膨胀，国粹主义更加高涨。1917年后，日本相继成立了“大日本国粹会”、“关东国粹会”、“经纶学盟”等许多右翼团体。这些团体在社会上极力宣扬“国粹主义”和“忠君爱国”等军国主义思想。

在发动侵华战争及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的一些右翼军国

^① 若 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主义团体异常活跃。如“神武会”、“满鲜问题解决同盟”(头目也是头山满)、“国家主义青年同盟”等。

特别是 1910 年成立的退伍军人组织“在乡军人同盟”,该组织极力宣传军国主义思想,灌输《教育敕语》内容,倡导“忠君爱国”,特别是对社会青年具有很大影响和精神约束力。

(四) 利用文化、宗教等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利用文化和宗教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进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特点之一。从明治初期至二战期间,日本一直通过组织青年、军人、在乡军人参拜乡间的招魂社、伊势神宫、靖国神社,每年春秋两季参加“皇灵祭”、“招魂祭”等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对青年和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教育其具有为天皇和军国主义献身的精神。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就将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作为全国最高的军国主义教育基地,至今一直继承了这一传统。

在宗教方面,日本主要利用神道教极力推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神道教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即被定为国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政府长期对民众进行“敬神爱国、崇祖忠皇”教育,宣扬“国家神道”、“圣战”、“八 一股”等等。二战期间,日本还在本国以及中国和朝鲜到处兴建神社,从文化上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除神道教外,儒学、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在战时也被作为军国主义教育的御用工具,令各种宗教必须为日本的“圣战”服务,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和教

二 军国主义教育的几个方面和主要内容

(一) 进行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脱亚入欧”,采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后,不但没有削弱天皇的地位和权威,反而逐步强化、神化了天皇在国家和军队中

的绝对权威地位。这是日本政治和历史的独特特色。

日本首先是通过宣传教育忠君思想,来神化和使天皇权威化的。日本宣扬天皇是神,是神武天皇的后代,有“三件神器”为证。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继而又将天皇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如此军队就是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的”、“神圣的”行动。

日本进行效忠天皇教育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进行“国体教育”。所谓“国体”即天皇制,所谓维护“国体”,也就是维护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在此教育中,也把“国体”宣扬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

强化捍卫团体,就是维护天皇制及在天皇体制下的军国主义。二战期间,日本更强调“国体”教育对坚持军国主义的重要性。直至日本投降时,日本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只要能保住国体,即保住天皇和天皇制就投降。日本在这方面曾提出“日本国体论”、“天皇归一主义”等等。

(二) 进行“尚武”和“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精神教育

日本军队在明治维新后是仿照德国普鲁士军队建立的,其后又进行了改革,与德军的绝对服从和扩张主义一脉相承。日本和日军尤为重视“尚武”的教育。

“尚武”教育的中心内容是武士道教育。日本民族自古,始终不断进行征战,武士享有特殊地位,社会上也形成一种“尚武”的精神和传统。后来日本逐步形成一种“武士道”的武士文化,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日本军国主义宣扬的武士道的核心内容是“忠”、“勇”。两者并之,相辅相成。所谓“忠”,即与忠君思想相结合,灌输“主从道德”。为了实现“忠”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继而又鼓吹

“勇”，即为天皇、为国家的“献身精神”。而“勇”的终极手段是死、玉碎、剖腹。为此，日本在推行军国主义的整个过程中，都一直鼓吹这一思想，颂扬“死的美学”，号召官兵和民众效仿这样的人物。如日俄战争时的统帅乃木希典大将曾为效忠明治天皇剖腹自杀，被誉为“楷模”。

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大和魂”。所谓“大和魂”，即武士道精神的主导核心，即效忠天皇、为天皇和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勇于献身的精神。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特点，是追求精神上的忠勇境界，而不贪图个人任何实利。日本军国主义把武士道推崇为“日本的行动精神”、“日本的推动力”，不遗余力地推行武士道教育。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始终贯彻绝对服从主义，教育尊皇的目的也是绝对服从天皇。

（三）推行军事扩张的军国主义教育

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打开了攫取、瓜分中国之门，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军事扩张、参与瓜分亚洲的野心，极欲并更加有恃无恐地推行军事扩张主义。军事扩张主义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日本为推行和强化军国主义，极为重视进行军事扩张主义教育。

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鼓动民族优越感，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

日本这种民族优越感的教育，也是建立在歧视和仇视亚洲国家各民族基础上的。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宣传自己是“神的国家”的同时，一直宣传“外夷野蛮”，称中国人是“猪仔”，称朝鲜是“野蛮国家”。翻开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其宣扬民族优越感，歧视和仇视亚洲国家的言论比比皆是。最近日本学者安川寿之辅所著的《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一书就披露了大量的这类典型的言论。

例如福泽谕吉,就宣传“日本为东方魁首盟主”,应“争雄东亚”。极右势力头目头山满鼓吹:“日本应该是称霸亚洲的盟主。”还有的称日本应是“指导亚洲的盟主”,甚至猖狂称“日本民族解放世界”。

为了实现充当“盟主”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又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东亚协同体”、“东亚共荣圈”、“从白人手中解放亚洲”等等,并称“这是大和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使国民和军队树立一种意识,即日本必须出兵,发挥军事作用,为“亚洲做军事贡献”。

在强化军国主义军事扩张教育中,日本军国主义者还鼓动国民以维护和寻求民族生存利益为目的,参与推行军事扩张战争。早在明治时期,曾任首相的政界元老山县有朋就提出中国、朝鲜是日本的“生命线”。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抛出“田中奏折”,又提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并提出保卫“北部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松冈洋佑又称“无满蒙即无日本的生命线”。对于东南亚地区,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是“海上生命线”,是日本的“资源圈”。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推行“海上生命线”教育,鼓动进行海上军事侵略与扩张。

日本军国主义者还不断加强“忧患意识”的形势教育,激发部队出兵“保护日本的利益”。例如日本在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就一直称阻止苏联的“赤色威胁”,宣传“日中战争必然论”、中国“威胁日本驻军安全”,日本“海上生命线受到威胁”等等,鼓动帝国军人“挺身奔赴战场”、“为国捐躯”。日本著名“战争文学作家”大冈升平就曾深刻指出,当时的军国主义者的爱国主义教育实际是鼓吹“爱国就到别国去,进行掠夺,屠杀别国人”^①。

^① 大冈升平:《战争》,九艺出版社,1975年。

三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特点及对国民意识的影响

(一) 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要特点

1. 军国主义教育的传统性和一贯性。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偶然,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具有密切关系,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亦非一日之功。在历史上,日本就一贯坚持“忠君爱国”、“万世一系”、“天皇是神”的教育。日本的武士道教育、“武运”、“尚武”精神教育,也是自封建社会武士阶级的出现以来就一直广泛进行的。

明治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将领,如福泽谕吉、山县有朋、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本身即是军国主义头目和鼓吹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者。

大正时代虽短,仅有 14 年,但是从天皇到社会上并未放松军国主义教育。大正天皇亲自颁布诏书、敕语,关心军国主义教育。社会上也广泛实施军国主义教育。进入昭和时代,军国主义教育也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各个时期的教育内容也前后一致,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

2. 军国主义教育具有彻底性、绝对性。

人们熟知,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军国主义教育,是残酷的、强制性的,学生、军人、社会上必须绝对服从和接受,无法逃脱这种教育,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教育。军人及每个日本人必须绝对服从天皇,在关键时刻必须为天皇“玉碎”。

军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专制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对整个军队和国民进行彻底的精神和思想控制,使官兵和民众确立绝对服从主义思想意识。

3. 军国主义教育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促使国民形成一系列的错误和反动

思想, 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对天皇制的教育方面, 把天皇神化、绝对化, 大力宣扬天皇的神话故事, 对一般群众影响至深, 令其对神之天皇深信崇拜至极。又如在武士道精神教育方面, 日本军国主义者竭力宣扬“忠君爱国”, 为天皇为国家献身的最终行为是死, 是精神修养的最高表现, 是一种美学。这种欺骗性使民众不分是非, 只要是天皇和军队推行的战争和军事行动, 就可轻易地随时为之去死, 因而致使许多日军官兵勇于为军国主义献出生命。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满蒙生命线”等宣传教育, 诱使广大贫困农民参加开拓团, 到中国东北开荒种地。这些农民真以为是来发家致富, 殊不知是在为军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政策服务。再如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宣扬“解放”亚洲, 反对白人殖民主义统治是日本的责任, 其实质也是欲将欧美殖民者挤出亚洲、达到独霸亚洲的目的。

(二) 军国主义教育对日本国民意识的影响

自明治维新以来, 日本国民长期受军国主义的强制和欺骗性教育, 受到深重的毒化, 精神思想扭曲, 军国主义意识也相当深, 至今在一些人身上也很难说得到了彻底清除。

在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下, 二战中日本国民意识中的“效忠天皇的意识”极为浓厚, 他们对天皇的神与神之权威深信不疑, 顶礼膜拜。不少官兵直至临死时, 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因此, 在长期的军国主义泛滥与横行过程中, 他们都认为所做出的军国主义行为是忠于天皇的表现, 更不怀疑像天皇这样至高无上的神还会有错误, 直至日本投降时, 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时, 许多人还不相信这是天皇的旨意。即使日本战败, 不少人也不认为是天皇的责任, 直到过了半个世纪后的 20 世纪末, 日本还有人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 由此看见这

种国民意识影响之深。

自古以来,日本一直崇拜中国文化,虽有过圣德太子“日出之国的天子”的妄言,但长期以来民族优越感并未在日本民族意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一批维新派们看到西洋物质文明,并以西方物质文明的标准,开始萌生歧视中朝及亚洲人的意识。经过明治维新后的变革,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特别是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胜利,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大和民族优越感不仅充斥政界和社会上层,在一般国民中也日益普遍存在。许多人瞧不起中国人,对中国人、朝鲜人歧视心理很重,甚至看到中国人与日本人一同坐车都感到“岂有此理”。日本人当年在中国吃白米饭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中国人吃白米饭却被视为犯法。朝鲜人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时代讲朝鲜话被视为违法。因此,日本人在高谈人权、民主的当代,是完全想像和理解不到在军国主义时代,日本是如何任意歧视、虐待和杀戮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民族优越感对整个日本社会和国民意识的毒害是很深的。

这种民族优越感影响日本国民盲目投入战争,非但没有侵略的罪责感,反而感到是在“解放亚洲”,“拯救亚洲国家”,是在以实际行动促使亚洲从白人手中得到解放,并帮助一些地区实现了现代化,促进了发展与“繁荣”,例如对台湾的侵略就存在如此看法。由于这种思想意识根深蒂固,所以,至今日本社会上仍有一些人还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性质认识不清,始终认为“那场战争是正确的”,不肯认罪,反倒认为有理。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教育所形成的绝对服从主义,在日本国民中是有传统的,也体现出日本国民意识的一个突出特点。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绝对服从主义教育,不仅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军国少年”、“帝国军人”而且使整个社会都存在这种绝对服从的思想

意识倾向。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天皇,个人服从国家,已成为每个人的意识观念。因此,人们在言论和行为上没有自主性,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在参与军国主义侵略行为时,由被动转为主动,由胆怯到不在乎。日军在训练士兵屠杀中国人时,在上级的命令下,无论对方是什么状况,只要上级下令,没有思考的余地,坚决执行命令。在日本士兵的思想意识中,“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教育的结果,促成了全民皆武的局面。即使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意识没有泯灭,但是“尚武”的思想意识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这种精神意识,促使日军顽强好战,宁死不降。不仅仅是军人,地方上也出现类似状况。在中国东北的开拓团中,曾不断出现日本丈夫杀死妻子儿女全家“玉碎”的情况。在冲绳岛战役中,亦有日本女中学生去“玉碎”。这种“为国捐躯”的国民意识使日本国民深受其害。

在一系列军国主义教育下,日本人中也产生一些谬误的思想意识观念。例如,明治以来的历次侵略战争,不问性质,不问青红皂白,都认为是为了国家的战争。参加战争死去的人,不论地位以及战争行为、性质如何,都是“为国捐躯”,“死了都是神”,都应怀念和悼念。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包括一般士兵,也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诸“神”。而对于被侵略国家,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人,被大量随意杀戮,沦为日本军刀下的“鬼”。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无起码的同情心,例如一再否认“南京大屠杀”就是一例。这些意识观念又受到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渲染鼓吹,成为后来否认侵略战争,为侵略战争翻案和歌功颂德的舆论导向,至今仍未得到清除。

(责任编辑:林 昶)